

繆文远著

戰國策新校注

(上)

巴蜀書社

繆文遠著

戰國策新校注
(上)

巴蜀書社



繆文遠著

戰國策新校注
(下)

巴蜀書社

责任编辑：袁庭栋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封面题签：缪 钺

扉页题签：黄稚荃

战国策新校注（上）

缪 文 远

巴蜀书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9.625 插页2 字数390千

1987年9月第一版

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90册

ISBN7-80523-140-0/I·61 （精装）

定价：6.10元

责任编辑：袁庭栋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封面题签：缪 钺
扉页题签：黄稚荃

战国策新校注（下）

缪 文 远

巴蜀书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9.875 插页 字数394千

1987年9月第一版

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90册

ISBN7-80523-141-9/I·62

定价：5.95元

戰國策西周卷第一

縉雲鮑彪校注
東陽吳師道重校

西周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維氏皆
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
河南即鄭武王所營下都周公營以為都成周
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周公營以為都成周
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故地封朝之亂敬王徙都成
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朝之亂敬王徙都成
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鄠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
王以後所謂西周者豐鄠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
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東周者東都也威
也何以南洛陽為東周自洛陽下都東周者東都
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自立威公卒子惠公
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桓公卒子威公自立威公卒
鞏以奉王號東周設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
分治河南惠公既薨秦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
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

戰國策卷第一

東周

高誘注

秦興師臨周

續周
王後語

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

續
力出切後語注

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

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
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

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續
劉勰集

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

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

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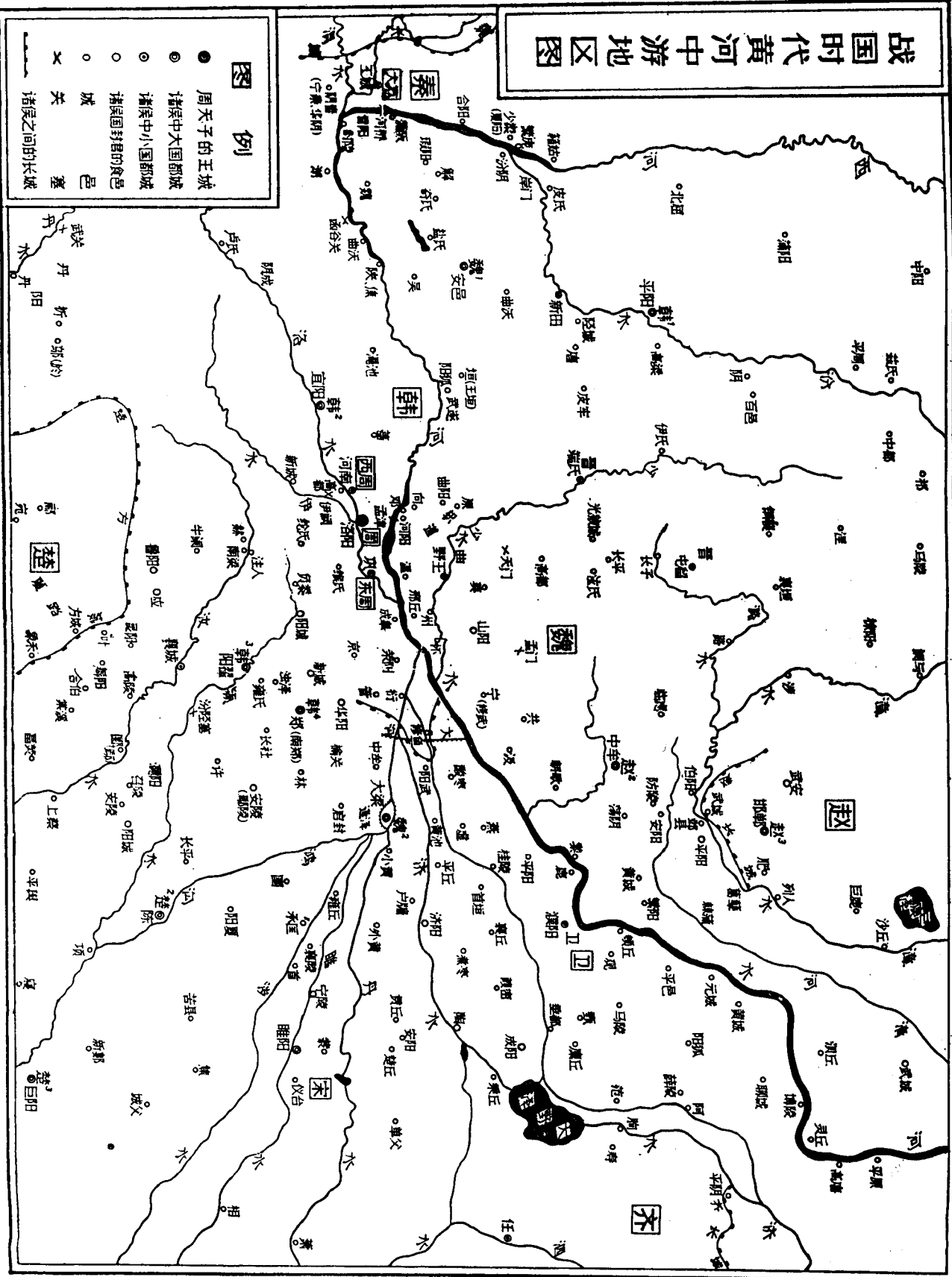
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

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

战国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图

图例

- 周天子的王城
- ◎ 诸侯中大国都城
- 诸侯中小国都城
- 诸侯国封君的食邑
- 城
- × 关
- 诸侯之间的长城



序

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繆文远君，治先秦史多历年载，于《战国策》致力尤深。勤蒐博采，研精覃思，既已撰著《战国策考辨》、《七国考订补》，由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刊行问世矣；近又董理积年旧稿，对《战国策》全书校勘疏释，成《战国策新校注》，将付巴蜀书社印行。繆君持书稿相示，余读而善之，因书其端曰：

自东汉高诱注《战国策》，其后宋姚宏、鲍彪、元吴师道，均有校注。清人治《战国策》撰著成书者亦不下数家，其中固多精言正解，然亦不免疏误缺失，此固由于研虑不周，而凭藉不足，参证无从，亦一因也。繆君校注此书，既博览前人疏释考证之作，择善而从，又蒐采晚近出土之竹简、帛书、铜器、石刻，与文献参稽互证，细心研寻，遂能发覆纠谬，度越前修。此固由繆君用力精勤，抑亦时代之赐矣。兹就释事、释人、释地、释官、释文辞诸端举例以明之。

释事者：《齐策一·邯郸之难章》载魏攻赵邯郸，齐军救赵，败魏于桂陵事。本书取银雀山所出《孙臆兵法》以印证之，较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所记更为本末详尽。又《秦策二·医扁鹊见秦武王章》载扁鹊以石为秦武王医疾事。本书取山东出土之汉画像石“扁鹊针灸行医图”（此石今藏曲阜孔庙

内)加以证释,其事益明。

释人者:《中山策》载司马喜相中山,旧注于司马喜但言其为中山臣。本书取《吕氏春秋·应言》载墨者师与司马喜(喜与喜古通用)于中山王前议兴兵攻燕事,证以河北平山所出之中山器,知此司马喜实即《中山王鼎》铭文所言“奋桴振铎”亲率三军攻燕之中山相邦司马翊。又《战国策》多记奉阳君事,其人亦见《史记》。但此奉阳君为何人?与李兑是否一人?众说纷纭,迄无定论。本书证以马王堆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第十二章,奉阳君自称其名为“悦”,“悦”即“兑”字,则奉阳君与李兑为一人明矣。

释地者:《秦策三·范雎至秦章》载秦昭王听范雎之说,“举兵而攻邢丘”。“邢丘”,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作“康丘”,《魏世家》作“鄴丘”。云梦秦简《大事记》:秦昭王“四十一年,攻邢丘。”本书取以证《战国策》作“邢丘”为是,而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谓当依《魏世家》作“鄴丘”,乃误说也。

释官者:《齐策二·昭阳为楚伐魏章》载楚昭阳伐魏时,“官为上柱国”,而《鄂君启节》铭文则谓“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”。本书取《鄂君启节》铭文以证“上柱国”即是“大司马”。

释文辞者:《燕策二·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》云:“今王(指燕昭王)信田伐与参、去疾之言,且攻齐,使齐犬马骹而不言燕”。鲍本无“骹”字,注云:“犬马,言已贱齐为之也,又不泄燕之谋。”吴师道曰:“字书无‘骹’字,恐即‘贱’。”鲍、吴之说,令人费解。金正炜《战国策补释》则谓“‘犬马’疑是‘大焉’之讹,‘大’与‘泰’通,‘泰’

焉’者，言不以燕为虑也。‘戢’或‘浅焉’二字误并为一，浅焉，犹浅然也。”金氏之说，穿凿支离，且与原文文义相反。本书取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第四章以校《战国策》文，知“使齐犬马戢而不言燕”实当作“使齐大戒而不信燕”，文从字顺，积疑尽释矣。

缪君于六十年代初期草创此书，一九六六年，因故辍笔，未敢示人。至一九七六年秋，阴霾既扫，日月重光，始得重理旧业，黾勉成书，盖前后更历二十余年矣。书中于诠释文辞之外，特重年代、地理、职官、制度之考订阐释，深有裨于治先秦史者；而自订体例，去繁琐，去重复，去谬误，弃芜存精，简要爽洁，于读者尤便焉。余尝谓治学之道，贵能继承，能开创，所谓“温故而知新”者是也。然抱残守缺，暖姝自悦者，不足以语于温故；而大言空论，哗众骇世者，亦不足以语于知新。必也，沈酣故籍，而不墨守陈言，探索新知，而不妄逞私臆，立一说，树一义，实事求是，折衷至当，始可称为治学之康庄。今缪君所为，庶几近之。

余平生向慕顾亭林先生，思为宏通征实之学，以期有裨于世用。缪君从余游者三十年，耿介淡泊，不染阉然媚世之习，故独能深有契于余之所怀。今缪君研治《战国策》、先秦史，既已著述斐然，卓尔有以自见矣，然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余更望其发扬蹈厉，温故创新，如骐骥千里之日进不已也。

缪 钺 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自序

一九八五年秋，文远撰《战国策新校注》既成，爰自题书首曰：

战国时期为吾国古史剧变之会，世卿世禄之制废，纵横游说之风起，朝为布衣，暮为卿相者，比比然也。其显名诸侯者，若公孙衍、张仪、陈轸、苏秦辈，类能左右一时政局，为世所艳称。且不独辩士为然，诸子百家之伦，凡欲得君行道者，莫不于游说之术三致意焉。墨翟之止楚攻宋也，既使公输为之折服，又使楚王自道“请无攻宋”（见《墨子·公输》）。《庄子》书载惠施、庄周反覆辩难，汪洋恣肆，浩瀚无极。儒家之孟轲更以“好辩”著称（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，虽口吃而善著书，精于谈说之道。韩非谓游说之难，在难于揣摩人主心理，其言曰：“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。夫龙之为虫也，柔可狎而骑也，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若人有婴之者，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，则几矣”（《韩非子·说难》）。韩非重视游说，故广集资料，储以备用，今《韩非子》中《内、外储说》及《说林》诸篇，论其性质，实与《国策》之文为近，其中有多篇亦见收于《国策》。此类流播及传习之说辞，多为记言体，作之非一人，成之非一地，大抵皆战

国、秦、汉间游谈之士所为，其中或与史实符合，或纯为游士练习模拟之作，读者当细心抉择，分别观之，不可一概论也。

辩士之于人主也，所操者纵横权变之术，为时君出奇策异谋，转危为安，运亡为存。太史公曰：“三晋多权变之士，夫言纵横强秦者，大抵皆三晋之人也”（《张仪列传赞》）。又言蒯通“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”（《田儼列传赞》）。而主父偃亦尝“学长短纵横之术”（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）。西汉初叶，先有韩、彭、黥布等异姓王之封，及刘邦、吕雉诛锄功臣后，又复有刘氏诸王之封，局势有类战国，故秦及西汉初期，纵横犹为世显学，传习靡替。

战国史籍不幸而遭秦火之厄，六国及周室所藏者，尽为始皇付之一炬，竹帛烟消，坟典散亡，徒令后人兴“考古茫昧”之叹。汉兴，遗书渐出，记纵横之书既见收于中秘（刘向所见者是），亦有民间流传，佚出于中秘之外者（如马王堆帛书）。西汉成帝时，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群书，今所传《战国策》即刘向校录诸书之一，书名亦为刘向所加。刘向《战国策书录》曰：

臣向所校中战国策书（按：指中秘所藏记辩士游说之简策），中书余卷，错乱相揉莠，又有国别者八篇，少不足。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，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，除复重，得三十三篇。……中书本号，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（按：短长，犹言“纵横”）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修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

远在刘向校书之前，司马迁为太史令，舳石室金匱之书，得见此类文献，即曾采录于其巨著《史记》中。宋洪迈谓：“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二则”（《容斋四笔》卷一）。据今人郑良树统计，《史记》采自《战国策》者，实有一百四十九处（见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）。司马迁所见之战国纵横家言，其未经刘向编订之原始面貌，今尚可于马王堆帛书得其仿佛。

秦、汉而还，历世绵邈，书缺有间，治战国史事者，舍《战国策》而莫由，此自司马迁时已然，后世更无论已。《战国策》之文，笔势纵放，英伟恢奇，才华横溢，感人至深。今载于《燕策一》之乐毅《报燕惠王书》，司马迁谓蒯通及主父偃读之，“未尝不废书而泣”（《史记·乐毅列传赞》）。唐之韩愈，宋之眉山苏氏父子无不深受《战国策》熏染。苏洵外出，每携一书自随，人或窥之，则《战国策》也。明李梦阳尝谓：“《战国策》畔经离道之书也，然而天下传焉，后世述焉”，此由“录往者迹其事，考世者证其变，工文者模其辞，好谋者袭其智”（《空同先生集》卷四十九《刻战国策序》）。考史论文，《战国策》俱在所必读，以故治此书者，自汉迄今，代不乏人，惜无人汇集而理董之，余之所作，有志焉而未逮也。

《战国策》之版本，大别之，其流有二：

此书传至宋初，一度散佚，经曾巩整理校定而三十三卷复完。南宋初，剡川姚宏校注是书，忠于原作，态度矜慎，至清代经黄丕烈影写覆刻（在《士礼居丛书》内），流布极广，此本今通称姚本。

与姚宏同时，缙云鲍彪亦注是书。鲍氏改易原文，重新编次，颇为后人讥弹。元吴师道撰《战国策校注》，就鲍本订其

失误，加以补正，释疑解滞，甚便读者。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曾将元刻本吴书影印收入，其他重刻本世亦多有。此本今通称鲍本，实包吴氏校注在内。

余意，校理《战国策》本文，举《士礼居》及《四部丛刊》二本，则若网之在纲，有条而不紊，不必侈陈众本，陷于琐屑短钉。至于《战国策》传本源流，今人范祥雍曾写为专文，论述綦详（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一九八四年第三辑），兹不复赘。

今者，党中央号召整理古籍，发扬我国数千年优秀之文化，以激励后学，振兴中华。文远深受鼓舞，故不辞谫陋，将旧日疏释《国策》之稿加以董理，以期于整理古籍之宏业有涓埃之助。于是检校群籍，丹黄杂下，春来秋去，寒暑屡更，今全稿虽告杀青，而颇有力尽神疲之感。本稿撰写过程中，经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列为重点项目，并得委员会研究基金直接资助，对国家与人民之关怀，文远衷心铭感。

文远自髫龄就傅，即喜读《国策》之文，稍长，读《史记》诸书，益震骇于苏秦、张仪辈之飞辩骋辞，而不能辨其是非，盖犹未脱童稚之见也。既冠，负笈锦城，研治古史，廖彦威师不以菲材而弃之，常为讲授古今学术流变、前贤治学之高怀远识、精思勤力，并详述自身治学之甘苦，讥弹今世学风之流弊。春风拂煦，诱掖毕至。文远虽赋性鲁钝，然亦激励奋发，深知自勉，前所撰《战国策考辨》、《七国考订补》已蒙师审订问世矣，此稿之经营，仍得吾师指示体例，审读原稿，更复题签赐序，益觉篇简生辉。巴蜀书社袁庭栋同志，往返商榷，先后多所匡正。此稿得以公诸于世，得力于时代之赐及师友之助者为多。今虽规模粗具，而讹缺难免，惟冀博雅通人，

不吝指正，教督以所不及，则匪只文远一人之幸而已。

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教授远道惠寄小川环树教授和他本人有关《战国策》之研究论著，供我参考，盛情可感，谨申谢忱。

缪 文 远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

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